

父亲给未婚妻的诗

□郭 欣

假如，我战死，我战死，
为了我的碧绿碧绿的府河，
和淡蓝淡蓝的的梦泽湖，
姑娘，你莫悲伤，莫悲伤！

假如，我战死，我战死，
请把我埋葬在那小丘顶上，
那苍翠苍翠的松林里，
姑娘，你莫悲伤，莫悲伤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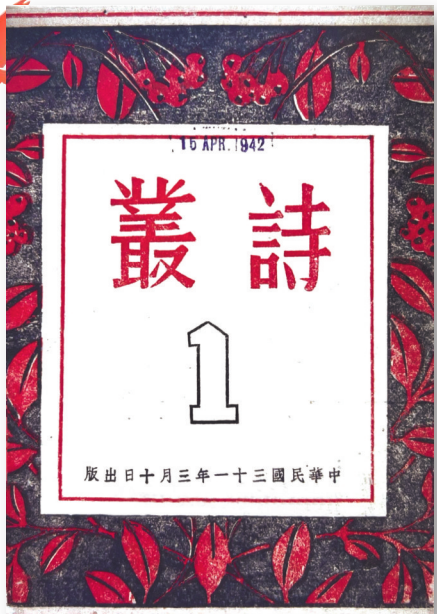
假如，我战死，我战死，
请为我立一块很小很小的石碑，
刻着：一个年轻人为祖国而战死！
姑娘，你莫悲伤，莫悲伤！

假如，我战死，我战死，
为我的府河，为我的梦泽湖，
我将永远默念着你的名字，
姑娘，你莫悲伤，莫悲伤！

假如，我战死，我战死，
让我静静地躺在故乡的山顶，
让我日日夜夜倾听你的呼唤，
呵，姑娘，你莫悲伤，莫悲伤……
1942年7月，于鄂中前线



晏明



《诗丛》创刊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是，遇见了平生唯一一个恋人——邓北野。国家的危难、共同的使命，令他们迅速走进彼此生命的深处。母亲来自河南省滑县，中等师范专科学校的优秀生。一个16岁的柔弱少女竟然独自跋涉千里，来到桂林投身抗日，在前线医院救护伤员。没想到，她还是个文学“迷妹”，写得一手漂亮散文，有不少发表在报刊上。在残酷的战争背景板下，他们的爱情点缀着几许文学的浪漫。两个年轻人憧憬着最终消灭日寇的那一天，喜结连理。然而侵略者的铁路跨过黄河，染指鄂中大地。父亲不能忘怀家国之痛，决然惜别挚爱，挺身鄂中。

一

“七七事变”时，父亲还是个高中生。在学校，他不仅是学生会主席，还担任抗日宣传队队长：刷标语、作讲演、演活报剧……面对国土一片片沦陷，他再也不能安坐课堂。他告别父母，告别湖北省云梦县那简陋的茅屋，投身抗日热潮。

来到武汉，他加入著名的忠诚话剧团，随团到各地巡演抗日话剧—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李秀成之死》《凤凰城》等，唤醒民众。但他发现以诗作刀枪，更为犀利，更能彻底释放自己的爱与恨，于是果断辞别剧团，在出租屋里没日没夜地埋头写诗。父亲的抗日诗歌飞向大江南北，短促、铿锵，像投枪，似利箭。他的长诗《火焰》《悼张自忠将军》等更是喷涌着刺目的激情和血色，在抗日战场上久久回荡。

1940年，他来到重庆，这里聚集了大批抗日进步文人。父亲有幸结识了郭沫若、老舍、茅盾、臧克家、何其芳等大师级人物，参加了众多抗日集会和活动。刚刚20岁的父亲被奔涌的抗日浪潮一次次淬炼。由于经济凋敝，他在山城找不到工作，常常一两天才吃一顿饭，但仍以初生牛犊之勇创办了重庆第一家诗刊《诗丛》，高扬起一面为民族危难呼号的旗帜。“为抗战而歌，为民族解放而歌”是办刊的唯一宗旨。可惜最终因资金难措，《诗丛》只出版两期便停刊了。但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，仍然奇迹般地珍藏着两套崭新的《诗丛》，留存着这位贫寒诗人青春的印记。

父亲不得不转移到桂林，那是抗日文人另一处聚集地。他不仅结识了更多的诗人和作家，尤为庆幸的

二

父亲来到湖北省荆州市郝穴镇，这里距日寇第一线哨兵只有十几里。他办起一张《胜利报》，四开四版，周刊，编辑、记者、出版都是他一个人。他认为，唯有身处烽火最前沿，才能迅速报道将士们英勇杀敌的事迹。他走遍战场每个角落，也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。

那天他乘船过江，行至中途，只见日寇开着汽艇追赶而来。日寇高呼乱叫，不停地射击。尽管船老大拼命划桨，但死亡的时刻仍在一分一秒地逼近。最后关头因汽艇的马达坏了，一船人算是侥幸逃生。

一天去采访，突然发现一群日寇从远处迎面而来。父亲立即躲进芦苇丛。日寇在距他不足10米的地方来回巡逻，他不得不在芦苇的泥塘里趴了一整天，直到深夜点燃火把作信号，引来对江的渡船才得以脱险。

父亲有个忠实的“战友”——一匹“高大、剽悍、矫捷”的栗色战马，多次在危难中拯救了他。后来，父亲专门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《我和栗色马——抗日战场上，一个真实的故事》，纪念与栗色马的非凡经历和特殊情谊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以配乐朗诵的形式播出了这首长诗。

有个深夜，父亲骑着栗色马到火线采访，刚进村口就听见机枪扫射声。一位白发老汉突然蹿出拦马高喊：“快跑，鬼子进村了！”父亲还没反应过来，栗色马已瞬间掉过头，发疯似的狂奔，冲出村庄。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追击而来。当一切喧嚣都渐渐消失，栗色马才停下脚步，不住地打着响鼻，像是在庆祝胜利，而

栗色鬃毛却早已被汗水浸透……

三

在鄂中，父亲采写新闻的同时，还以“抗战诗草”为副题，写了50多首抗战诗歌，许多作品都是在马背上完成的。这首诀别诗《假如，我战死……》就是其一。

尸骨横飞的画面在父亲眼前无数次呈现，战时的邮路完全断绝，挚爱音讯全无——那是他最为惦念、最为放心不下的所在。他用诀别诗对挚爱和祖国作告别，也是对身后所有祈愿作最后的托付。

在家乡湖北省云梦县，父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，他的诗歌很多人都可以张口背诵。诀别诗《假如，我战死……》更是深入人心。云梦县文联主席张赤平撰文说，与众多诀别诗不同，《假如，我战死……》没有选择宏大的战争场景叙事，而是以私语般的温情，构筑了一个即将赴死的战士复杂而真诚的内心世界。在祖国、故乡与恋人之间，诗人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精神坐标，完成了一次对死亡的神圣超越。“全诗不过二十行，却包容了丰富的时代和思想内涵，既庄严又温情，既直面死亡又超越死亡，既关乎民族命运又珍视个人情感。这首诗不仅是诗人晏明对祖国、对挚爱的告白，也是千千万万在前线殊死搏杀将士的告白，短短二十行的诀别诗无愧于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！”

1943年2月，父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告别鄂中，奔赴鄂西恩施，应邀主编《武汉日报》副刊，并与母亲完婚，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了抗日的新征程。

作为后人，我们当然不会忘怀父辈的奉献与豪迈，文学界也没有忘记他们那一代献身者的身影。1995年6月，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，中国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联合推选了100部产生于抗日烽火之中、表现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优秀文学作品，这首《假如，我战死……》光荣入选。这，不仅是对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嘉奖，也是对父亲伟大献身精神的最高褒奖。

隐入黑白尽处

——聂卫平怀想

□白 描

获悉聂卫平逝世的消息，心绪骤然一横，跟着便沉了下来。从青丝染霜到步到老境，这些年里，“某某某走了”的讯息听得不算少。每一回听闻，心头总有微澜泛起，那些与逝者相关的往事，会不自觉地在脑海中盘旋。只是从前听闻的，多是疏离之人、岁月过客，纵有感慨，也难生深切的宿命感。也曾从史书与文学作品中，结识过许多跨越时空的灵魂。凝望他们的落幕，品读他们的归期，心绪总会翻涌难平。可这与听闻聂卫平先生这般有过交集的故人离世，心境终究不同。后者是逼着自己，将他人的生死与自身的生命相连，去叩问：生命究竟有何意义？

近年我写过不少怀念友人的文章和诗词，每一次落笔，都是与友人的隔空重逢，亦是与自己内心的深度对话。他们的离去，总让我不自觉地反观自身。就如聂卫平，他以围棋名满天下，我以文字安身立命，我们的人生轨迹本无交集，却因一份共同的热爱——足球，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们都是广州《足球》报的特约专栏作者。我曾在报上开设专栏，点评足球赛事，尤其是在1994年世界杯期间，几乎每场赛事落幕，都有一篇专栏文章见报。聂卫平亦与这份报纸渊源深厚，报社曾邀我们同赴广州。有时报社有人来北京，也都设宴款待我们。我们便常聚在一起，或举杯畅饮，或围坐观球，言谈间，说得最多的便是足球。偶尔我会提及围棋，只是我于弈道半通不通，对话自然难入深境。唯有说起足球时，两人都眉飞色舞，全然卸下矜持，畅怀恣意如同孩童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聂卫平曾说过一句话，我至今深以为然。他盛赞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确立，认为这份体制的建立与健康运行，远比中国足球队打进一次世界杯意义深远。“这是从根源上推动中国足球向职业化转型的关键一步，”他拍着桌子，情绪激昂，“是真正的筑基之举！”他饮酒是豪饮，带着几分粗放，言语铿锵，常有粗口爆出，那份不拘无束的真性情，格外动人。后来人事变迁，我们往来渐疏，可90年代那些一起喝酒、畅谈足球的时光，始终清晰如昨，时常在记忆中浮现。

这股强悍的人，这般的黑白棋盘上创造无数传奇的英雄，这般的曾于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临危不乱、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强者，竟也说走就走了。我不知他晚年染病，在我心中，他始终是那个传奇——即便次日有生死对弈，他仍能在酒肆里端起饮用清酒的瓷杯豪饮。那份从容与洒脱，无人能及。

这股性情中人，永远远离了他挚爱的围棋，离开了他眷恋的世界，离开了爱他的亲友与万千粉丝。我不禁思忖：生命究竟凭何支撑起那份强大？他曾那般耀眼，那般坚韧，可脆弱起来，竟也这般不堪一击。

这份关于生命强与弱的叩问，早在作家路遥离世后，便曾长久萦绕在我心头。

路遥身形粗壮，五短身材却虎背熊腰，看上去健壮如熊，给人一种坚不可摧、顶天立地的感觉。他能吃能睡，鼾声大得惊人——在五楼就寝，一楼也充耳可闻。谁也不曾料想，这样一个看似打不倒的汉子，会轰然倒下。1992年，西延铁路通车。身为陕北人的他满心欢喜，独自一人背着行囊，登上首趟列车奔赴延安。8个小时的车程，上车时还是意气满满，下车时却已虚弱到无法站立。是延安的友人将他抬下火车，从车站直接送往医院。

在延安医治无果后，他转往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，也是搭乘这趟列车返回西安，由陕西作协的同事从车上拍下，送往病房。彼时我已调往北京，1992年11月1日，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，我专程从北京赶回西安探望他。昔日健壮的他，早已瘦弱得脱了形。那一刻，我们百感交集，如柳永笔下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的境遇，千言万语堵在心头，终究只剩沉默蔓延。

许久之后，他才缓缓开口，问及我曾疗养过的临潼空军疗养院，问那里的条件如何，嘱托我为他引荐。“等出院后，要去那里好好调养。”他语气里藏着对生的渴求，他还要做许多事，还要拥抱这个深爱的世界。可我回到北京没多久，11月17日，便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，打碎了所有希望。

这些与我年纪相仿、朝夕相伴过的人接连离去，逼着我一次次将生死与自身相连，探寻生命的真谛。我终究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，只觉得生命的意义，或许就藏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：是晨起望见的朝阳，是日暮邂逅的余晖；是风拂耳畔的温柔，是蝶舞花丛的灵动；是尝到蜂蜜的甘甜，是感受细雨落在肩头的微凉。春日里，能嗅到青草破土的清冽香气，能沉醉于繁花绽放的馥郁芬芳；冬日里，在雪天行走，能感觉到雪花在额头眉间融化，能看见哈出的气化作一缕雾气。寻常时日，手上扎刺的微疼，眼睛吹进沙尘的不适，这些真切的感知，皆是生命存在的证明。正因为活着，才能体会这份美好与苦涩，才能感知这世间的万般滋味，才算不负这一趟生命旅程。

我向来看重生命的质量与做人的尊严。我为自己的人生立了一个朴素的标准，六个字：不自欺，不欺人。对得起自己的内心，不辜负身边的亲友，不亏欠这世间所有的相遇，便已足够。

或许，生命的意义，本就是一场奔赴，一场造物的轮回。我们自尘土中来，从不可知之处启程，在这世间行走数十载，遇见一些人，做成一些事，留下些许值得回忆的片段，最终又将所有情愫与痕迹，归于虚无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本就是生命既定的归宿。

这浩瀚宇宙，芸芸众生，世间万物皆在自己的轨迹上生长、绽放、凋零。无论是璀璨夺目，还是平淡无奇，都曾真实地呼吸过、活过、感知过。一场生命落幕，便有另一场生命启程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这，或许就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



阳光下的行走

□浦 子

这次行走发生在2025年12月6日上午10时50分。晴。

远远的，我就看见陈思和先生与他的学生陈丙杰在那座长廊下等我。陈思和先生的身上洒满了阳光，比阳光更有穿透力的是他那深邃的目光。

他远远地就举起欢迎的右手。我三步并作两步。先生的身子依然挺拔，脸色盎然如春。最终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他拄着一根拐杖的左手上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没有这根拐杖，先生刚才欢迎我的时候，左手和右手大概会同时伸出。

先生一直是用两只手帮扶别人的。2010年10月初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龙窟》的研讨会在宁海温泉举办。当年还没有杭州湾跨海大桥，先生是当天从上海坐车至杭州绕行500多公里赶来的，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。在他临近中午赶到会场时，留在我记忆里的见面的第一个动作，是他用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说：“浦子，恭喜你！”在下午的会议上，他第一个发言后，与大家一起合了影。下午2时，他便乘车回上海，说是有一批重要客人已经在上海等着了。他当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天

正是中文系系庆的前一日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已经齐聚上海。他居然为了我这个无名作者的研讨会，一天之内奔波一千多公里。

我知道先生2025年上半年因脑梗住院。他脸色平和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轮位置，说，医生说脑梗的位置在这下面，他的思考部位万幸不致受损。此刻，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同时庆幸病魔在伟大的思想前停住了脚步。他说，现在出院了，别的已经恢复正常，这只左腿刚开始没有半点知觉，移动身子时就如拖了一只沙袋，现在在康复师的帮助下，有了一点知觉。“哈哈，”他诙谐地笑着说，“脑神经与腿神经，暂时短路失联了。”

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前去搀扶住先生的。陈丙杰给我们拍了两张照片。照片上，先生气宇轩昂，神采依然，我倚立在一边，矮了半个头。我的手看似在搀扶先生，实则更像是先生在提携我。

2017年10月28日，在先生的主持下，我的“‘王庄三部曲’学术研讨会”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，先生作主旨发言。之后，先生在《坚持民间写作的作家——读浦子的长篇小说‘王庄三部曲’》中谈道：“浦子

创作的长处是写民间故事，擅长将民间故事的想象力和现实社会中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起来，由此透露出沉重的文化反思气息。这与我的研究兴趣比较相近。”我的王庄系列长篇小说正是在先生理念的推动下，一部接一部面世的。

先生在左，我在右。我的左手携着他的右手，我们继续向前踱步。先生还和我聊起他最近的一篇文章，文中记述的是他与韩国朴宰雨教授的交往过程。

在小区门口的小酒馆里，先生将酒馆的好菜悉数点上，满桌的菜肴仿佛他满满的情谊。用餐期间，我还带给先生一个好消息，我的新书即将出版。

“好，好！”先生说着举了一下双手，像是捧起理想的果实。

我送先生的礼物都是家乡浙东的土产，其中有一小瓶炒花生米。花生是土产的，海苔是土产的，白芝麻也是土产的。这是我爱人来上海之前特意在家炒制的。

先生最后用上海话说：“这花生米，我非常喜欢。”出了酒馆，离开之前，我最后瞥了一眼先生居住的小区。先生拄着拐杖一直向前走去，“笃”“笃”，拐杖叩击地面的声音清晰可闻。他身后身后皆是跳跃着的阳光。